

水滸研究文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44.563.083
309

水滸研究論文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3346445

14789



水滸研究論文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東四 大多胡同 4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發售處可認出字第 057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书号 604 字数 297,000 开本 60×116 纸 1/32 印张 11.16 插页 1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5000 册

定价 (7) 1.40 元

出版說明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的編輯，是为了把今天以前新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所寫的論文，分門別類，集中起來，以便於研究者和讀者的閱讀，並从這些論文集里，約略可以看出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發展情況。我們希望這一些書的出版，能對古典文學研究者有所幫助。

這是參考資料性質的書。收輯的範圍很廣，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當時有過一定影響的，概行收入。這些文章如果是較早發表的，往往已經不能代表作者今天的意見；可是，為了忠實於歷史，我們征得作者的同意，不作任何論點上的、原則上的修改。

所收的只是截至發稿以前我們所能找到的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散篇論文。未曾發表的文稿，整本的專著，已經被收入作者自編的論文集或其他選輯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的序言，均不收入。

我們現在編出“楚辭”、“樂府詩”、“元明清戲曲”、“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六種研究論文集。文章按其性質略加區分，基本上就發表時間先後排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	茅 盾 (1)
“水滸”的作者与“水滸”的長篇結構………	李希凡 (6)
水滸的細節描寫与性格………	李希凡 (22)
“水滸”——英雄的史詩………	路 工 (30)
談水滸傳………	宋云彬 (35)
談談“水滸”………	張默生 (43)
對張默生先生“談談‘水滸’”的意見………	賀遠明 (54)
對賀遠明同志的文章的几点意見………	張默生 (58)
“水滸”與農民革命………	王利器 (61)
談“替天行道”及其它………	張友鸞 (77)
談施耐庵是怎样創造梁山泊的………	王利器 (82)
談“水滸”中的幾個問題………	劉 中 (92)
讀‘談‘水滸’中的幾個問題’………	李 磊 (98)
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	張文勳 (104)
試論水滸傳的著者及其創作時代………	陳中凡 (111)
我怎樣學習“水滸”………	羣 明 (127)
試談讀“水滸”的態度………	張 真 (135)
對“試談讀‘水滸’的態度”一文的意見………	李 育 (140)
答李育同志的質問………	張 真 (143)

- 从文学藝術的特質去看古典文学作品 張文勳 (149)
對於向古典文学作品學習的几点意見 賈文昭 (155)
兩点意見 周行 (159)
不能盲目學習古代英雄 諸葛德 (160)

- 談豹子頭林沖 李希凡 (162)
黑旋風李逵 顧學頤 (169)
談“武松打虎” 路工 (174)
水滸怎样描寫武松打虎 周光廓 (180)
談“林教头風雪山神庙” 陳繼生 (189)
水滸“智取生辰綱”的分析 陳繼生 (196)
“大鬧野猪林”的結構和人物描寫 馮國定 (202)

- 宋江考 張政烺 (207)
略談“水滸”評價問題 李希凡 (224)
水滸傳和宋史 華山 (232)
呼保義考 李拓之 (248)
關於宋江 苗得雨 (255)
“水滸”英雄的綽号 王利器 (271)
讀“水滸”英雄的綽号 丁一 (305)
燕青是怎样的一个人? 楊柳 (309)
“水滸”中所採用的話本資料 王利器 (312)
酒樓 王拾遺 (314)

- 關於“水滸全傳”的后半部 穆煊 (318)
金聖嘆怎样誣蔑宋江的 張友鸞 (324)

談金聖嘆 宋云彬 (332)

論水滸傳與水滸戲 楊紹萱 (336)

雜劇傳奇中的李逵 王玉章 (362)

陳忱和“水滸后傳” 成柏泉 (370)

“水滸后傳”作者陳忱的愛國思想 徐扶明 (376)

評何心著“水滸研究” 楊丁 (382)

附 錄

“決撤”解 張友鸞 (387)

七十一回本“水滸”的校訂工作 張友鸞 (391)

關於“水滸全傳”的版本及校訂 王利器 (398)

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

茅 盾

“水滸”的人物描寫，向來就受到最高的評價。所謂一百單八人个个面目不同，固然不免言之过甚，但全書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打以上各有各的面目，却是事實。記得有一本筆記，杜撰了一則施耐庵如何寫“水滸”的故事，大意是這樣的：施耐庵先請高手畫師把宋江等以下三十六人畫了圖像，掛在一間房內，朝夕揣摩，久而久之，此三十六人的聲音笑貌在施耐庵的想像中都成熟了，然後下筆，故能栩栩如生。這一則杜撰的施耐庵的創作方法，有它的顯然附會的地方，如說圖像是宋江等三十六人，就是從“宣和遺事”的記述聯想起來的，但是它所強調的朝夕揣摩，却有部分的真理，雖然它這說法基本上是不科學的。因為，如果寫定“水滸”的，果真是施耐庵其人，那麼，他在下筆之前，相對朝夕揣摩的，便該是民間流傳已久的歌頌梁山泊好漢的口头文学，而不是施耐庵自己請什么高手畫師所作的三十六人的圖像。

个个面目不同，這是一句籠統的評語；僅僅這一句話，還不足以說明“水滸”的人物描寫的特点。試舉林沖、楊志、魯達這三個人物為例。這三個人在落草以前，都是軍官，都有一身好武藝，這是他們相同之處；他們三個本來都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終於落草了，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頗不相同。為了高衙內想把林沖的老婆弄到手，於是林沖吃了冤枉官司，刺配滄州，而對這樣的压迫陷害，林沖只是逆來順受，所以在野猪林內，魯達

要殺那兩個該死的解差，反被林沖勸止；到了滄州以後，林沖是安心做囚犯的了，直到高衙內又派人來害他性命，這他才殺人報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楊志呢，第一次為了失陷花石綱而丟官，復職不成，落魄賣刀，無意中殺了個潑皮，因此充軍，不料因禍得福，又在梁中書門下做了軍官，終於又因失陷了生辰綱，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只有魯達，他的遭遇却是“主動”的。最初為了仗義救人，軍官做不成了，做了和尚，後來又為了仗義救人，連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水滸”從這三個人的不同的遭遇中刻劃了三個人的性格。不但如此，“水滸”又從這三個人的不同的思想意識上表示出三個人之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楊志一心想做官，“博個封妻蔭子”，結果是賠盡小心，依然落得一場空。林沖安分守己，逆來順受，結果被逼得無處容身。只有魯達，一無顧慮，敢作敢為，也就不會吃過虧。對於楊志，我們雖可憐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對於林沖，我們既寄以滿腔的同情，却又深惜其認識不足；對於魯達，我們却除了讚歎，別無可言。“水滸”就是這樣通過了絢爛的形象使我們對於這三個人發生了不同的感情。不但如此，“水滸”又從這三個人的思想意識上說明了這三個人出身於不同的階層。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蔭子”，只要有官做，梁中書也是他的好上司。林沖出自槍棒教師的家庭，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他有正义感，但苟安於現狀，非被逼到走投無路，下不來決心。至於魯達，無親無故，一條光棍，也沒有產業，光景是貧農或手藝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軍官。“水滸”並沒敍述這三人的出身（只在楊志口中自己表白是將門之後），但是在描寫這三個人的性格時，处处都扣緊了他們的階級成份。

因此，我們可以說，善於從階級意識去描寫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滸”的人物描寫的最大一個特點。

其次，“水滸”人物描寫的又一特点便是關於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說明，作者絕不下一按語。仍以林冲等三人为例，这三个人物出場的当兒，都是在別人事件的中間驟然出現的；魯達的出場在史進尋找王教头的事件中，林冲的出場在魯达演習武藝的时候，而楊志的出場則在林冲覓取投名狀的当兒。这三个人物出場之时，除了簡短的容貌描寫而外，別無一言介紹他們的身世，自然更無一言敍述他們的品性了；所有他們的身世和品性都是在他們的后来的行动中逐漸点明，直到他們的主要故事完了的时候，这才使我們全部認清了他們的身世和性格。这就好比一人远近而來，最初我們只看到他穿的是長衣或短褂，然后又看清了他是肥是瘦，然后又看清了他是方臉或圓臉，最后，这才看清了他的眉目乃至声音笑貌：这时候，我們算把他全部看清了。“水滸”寫人物，用的就是这样的由远漸近的方法，故能引人入勝，非常生动。

“水滸”的人物描寫就說到這裡为止罢。下面再略談“水滸”的結構。

从全書看來，“水滸”的結構不是有机的結構。我們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別編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無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來，“水滸”的結構是嚴密的，甚至也是有机的。在这一点上，足可證明“水滸”當其尙為口头文学的时候是同一母題而各自独立的許多故事。

这些各自独立、自成整体的故事，在結構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概而言，第一，故事的發展，前后勾聯，一步緊一步，但又疏密相間，搖曳多姿。第二，善於运用变化錯綜的手法，避免平鋪直敍。試以林冲的故事为例。林冲故事，从嶽廟燒香到水泊落草，一共有五回書，故事一开始就提出那个决定了林冲命运的問題，从此步步向頂點發展，但这根發展的線不是垂直的一味緊下去的，而是曲折

的，一松一緊的；判決充軍滄州，是整個故事中間的一個大段落，可不是頂點，頂點是上梁山，但林沖故事也就於此結束。在這五回書中，行文方面，竭盡騰挪跌宕的能事，使讀者忽而憤怒，忽而破涕為笑，剛剛為林沖高興過，又馬上為他擔憂。甚至故事中的小插曲（如林沖路遇柴進及與洪教頭比武）也不是平鋪直敍的。這一段文字，先寫林沖到柴進庄上，柴進不在，林沖失望而去，却於路上又碰到了柴進（柴進出場這一段文字寫得有聲有色），後來與洪教頭比武。林沖比武這小段的插寫，首尾不過千余字，可是，寫得多么錯綜而富於變化。說要比武了，却又不比，先吃酒，當真開始比武了，却又半真（洪教頭方面）半假（林沖方面），於是柴進使銀子叫解差開枷，又用大錠銀作注，最後是真比，只百余字就結束了；但這百余字真是簡潔遒勁，十分形象地寫出了林沖武藝的高強。這一小段千余字，還把柴進和洪教頭兩人的面目也刻劃出來了，筆墨之經濟，達到了極點。再看楊志的故事。楊志的故事一共只有三回書，一萬五六千字，首尾三大段落：賣刀，得官，失陷生辰綱。在結構上，楊志的故事和林沖的故事是不同的。林沖故事先提出全篇主眼，然後一步緊一步向頂點發展，楊志故事却是把失意、得志、幻滅這三部曲概括了楊志的求官之夢，從結構上看，高潮在中段。在权貴高俅那里，楊志觸了霉頭，但在另一权貴梁中書那里，楊志却一开始就受到提拔，似乎可以一帆風順了，但在权貴門下做奴才也並不容易。奴才中間有派別，經常互相傾軋。梁中書用人不專，注定了楊志的幻滅。同時也就注定了黃泥崗上楊志一定要失敗。故事發展的邏輯是這樣的，但小說結構發展的邏輯却從一連串的一正一反螺旋式的到达頂點。楊志一行人還沒出發，吳用他們已經佈好了圈套，這在書中是明寫的；與之對照的，便是楊志的精明的對策。讀者此時急要知道的，是吳用等對於此十萬貫金珠究竟是“軟

取”呢或是“硬取”？如果“軟取”，又怎样瞞过楊志那精明的眼光？这謎底，直到故事終了时揭晓，結構上的縱橫开合，便是这样造成的。

以上是對於“水滸”的人物和結構的一点粗淺的意見。如果要从“水滸”學習，这些便是值得學習的地方。自然，“水滸”也还有許多优点值得我們學習。例如人物的对白中常用当时民間的口头語，因而使得我們如聞其声；又如动作的描寫，只用很少几个字，就做到了形象鮮明，活躍在紙上，……这些都應該學習，但是从大处看，应当作为學習的主要对象的，还是它的人物描寫和結構。在这上头，我的偏見，以为“水滸”比“紅樓夢”强些；虽然在全書整个結構上看來，“紅樓夢”比“水滸”更近於有机的結構，但以某一人物的故事作为独立短篇而言，如上所述，“水滸”結構也是有机的。

(原載“文藝報”2卷2期)

“水滸”的作者与“水滸”的長篇結構

李希凡

水滸英雄的傳說和故事，曾經在民間流傳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至今在山东一帶，还有着各式各样的傳說（許多“水滸”專家們在這方面已經作了很多考証工作，我們不想再多談它）。這原因分析起來是很簡單的：水滸英雄是產生在農民革命鬥爭中的，他們代表著廣大的人民，向封建統治者進行過堅決有力的抗爭。在傳說中，有傳說者照自己的意見給以修飾和渲染，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人民喜歡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寄託在自己的英雄身上。事實上，這些英雄鬥爭的本身，也正是人民創造的，不代表人民和不為人民支持的“英雄”，都只能為歷史所拋棄。

正是由於人民的愛好，由於水滸英雄鬥爭事蹟的廣泛流傳，也才使得人民的藝術家採集了它們，把它們編成了自己說話演唱的內容，給予了更大的藝術加工。像宋羅燁“醉翁談錄”所談到的各種說話斷片：“石头孙立”、“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而“宣和遺事”所記述的宋江三十六個人的事蹟，就更加近似“水滸”某些情節的規模。把水滸英雄編成戲劇的有“黑旋風雙獻功”、“雙獻頭武松大報仇”、“宋公明劫法場”等，在王國維的“曲錄”里還錄有二十二種水滸劇目，甚至我們可以設想，在失去的話本和劇文中，還有着更豐富的內容。它們都出現在“水滸”以前（或者是以後），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水滸”作者在創作“水滸”時，曾經把它們作為自己的創作素材，吸取它們裏面的精華到自己的創作中間去。這

些都說明了“水滸”有着深厚的人民性的基礎。加里寧同志曾經說過：“最有天賦的詩人，最有才能的作曲家能在自己的創作上成為天才，只有當他們接觸到人民的創作並且從人民創作的源泉中去進行發掘的時候。否則就沒有天才的人物。”●

但是，題材的繼承性，和從民間創作中吸取它的精華，這都並不貶低“水滸”的價值，也絲毫不能夠就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水滸”沒有作者，而只有所謂“加工者”、“編輯人”。“浮士德”的情節，不知轉給多少作家的手，“哈姆雷特”也有過它的民間傳說階段，但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把歌德和莎士比亞叫做“浮士德”“哈姆雷特”的“加工者”和“編輯人”。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區分開來的，並不簡單是題材上的不同，更主要的是作者處理題材的藝術手法，尤其是有著相同題材的作品。因為題材的處理和題材的提鍊，反映著作者對於題材對於現實生活態度。在現實主義文學中，題材的提鍊，是作家依據自己的觀點，發展了社會現象和典型的生活衝突的內在規律，並且把這些規律貫徹到底。“浮士德”是描寫了歌德時代的理想，歌德時代還不能實現的真理，它和過去任何一部關於浮士德的作品，在本質上都沒有相同之處。哈姆雷特的故事最先是十二世紀丹麥作家格拉瑪奇卡斯所記述的丹麥的古老傳說，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却是借丹麥國王的城堡來表現當時英國現實生活中的衝突。滲透在這樣兩部偉大作品中的，是歌德、莎士比亞的觀點和藝術特色，這沒有被任何人否認過。而我們的“水滸”流變史的考據家們，却因為題材的相同而否認“水滸”曾經有過作者。只看見了它的題材的源流，却不願意看到“水滸”作者，而且只能是有這樣一個作者，對於水滸英雄故事的素材，作過藝術上的

● “加里寧論文學”，一七五頁。

概括提鍊，和独特性的創造，使原來的題材，大大地改變了它的面貌。

這些“水滸”流變史的考据家們，究竟根據哪些歷史資料呢？讀過他們研究著作的人，都可以清楚地記得，所謂“宋史”中的“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以及“十朝綱要”、“三朝北盟會編”、“東都事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等同樣的一段關於宋江等的記載，還有我們已經舉出來的“宣和遺事”、“醉翁談錄”里的說話人的節目，和那些“水滸”劇目，都被他們異口同聲地重複着。當這些薄弱的考証材料，不足以證明他們的論點時，就再加上對於說話業臆測的推想。於是，一部“煞有介事”的“水滸”流變史就形成了。在這裡，我們不想詳盡地分析這些材料和“水滸”的關係。我們只想指出，就以最可靠的“宣和遺事”來說，它和“水滸”的淵源，也只能是素材和創作的關係。它的粗略的故事梗概，根本還談不上有活生生的人物性格。並且就是在这个粗略的故事梗概里，也和“水滸”故事情節的發展，有着很大的不同，看過“宣和遺事”的人，誰都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否認“水滸”是有作者的。事實上從“水滸”一有刻本，一直就有兩個偉大的名字“施耐庵”“羅貫中”和它在一起。只是因為所謂“身世無考”，而不為“水滸”考据家們承認而已。但是，“水滸”考据家們這種粗暴的否定，是不能說服一個普通讀者的。因為在封建社會的文壇上，一貫是把小說看成文學末流的雕蟲小技。為此，中國有許多偉大的作家，喪失了他們留傳後世的歷史記載。這不只是“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甚至“聊齋誌異”和“紅樓夢”的作者，他們的歷史資料，也何嘗不是寥寥可數。這是封建統治者所造成的文壇上的悲劇，如果因此而否認一個偉大作家的存在，却正是落入了封建統治者的圈套中了。

“水滸”流变史的考据家們，由於否認“水滸”是由一个偉大的作家根据民間素材創作而成的，也就把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在蛛絲馬跡的考証材料上，杜撰出所謂“水滸”流变史，其結果就是根据“水滸”这最初一部長篇小說形式上的某些樸素的特点，而把它看成是“由几个主要人物的傳說綴合而成”的作品，無形中貶低了它作为長篇史詩的价值，甚至根本否認它是一部長篇傑作。

文学形式固然有它的歷史傳統的特色，但形式是被內容所决定的。离开了內容而侈談形式，这对於理解一部文学作品是有害無益的。为了駁斥“水滸”流变史考据家們的形式進化論的觀点，現在我想試从“水滸”一書的內容及其体現在形式上的特点，來分析一下它的長篇結構的特色。

中國古典小說形式歷來有它的傳統特色，那就是章回形式。一談到章回小說，人們总喜欢和它的源起“說話”联系起來看。至於在它形成中國特有的章回形式的長篇小說后所起的結構作用，就时常被人忽略了。似乎章回只是作为“說話”的遺跡留在長篇小說里，沒有什么結構意义。但是，文学發展的歷史啓示我們，民間藝術形式当其已進入文字形态階段，为作家所掌握，其結構形式往往失去了原來意义，而構成文学形态上的特点。詩、詞、曲是如此，章回小說也是如此。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第一部長篇小說“水滸”的章回形式，还殘留着說話階段的特色。正如上面所說，作为“水滸”素材的，是丰富的民間傳說和民間文藝，而它又是开始的第一部長篇著作。所以它不完全像后来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缺乏“紅樓夢”那样網式的交互錯綜的結構，而更多地具有說話講述阶段直線發展的特点，結構是依靠人物与人物唧接出現而展开，具有着直線的山嶺起伏的布局，从而許多章節有構成一个人物性格發展史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其他后来的章回小說所沒有的。在相对意义上，

从这个特点來看，正像茅盾同志在“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一文中所說：我們可以把“水滸”中“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別編为各自獨立的短篇或中篇而無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來，‘水滸’的結構是嚴密的，甚至也是有機的。在這一點上，足可證明‘水滸’當其尚為口头文学的时候是同一母題而各自獨立的許多故事。”●但是，同样的，由於“水滸”是由一个作家創作成功的，作為他創作素材的，不僅是民間藝術傳統，而更重要的是現實生活。“水滸”的產生，絕不像“水滸”流變史的那些考據家們所說的那样簡單：是由於都市在發展中，市民的文娛要求在發展中，而說話業是有競爭性的，說話人非有日新月異足以号召听众的东西不可。●把“水滸”這部長篇巨著的產生，簡單地歸結為“說話人的迫切需要”，“听众的需要”，实际上就是企圖抹煞文學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現象的性質。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在一定的歷史条件下產生的，尤其是像“水滸”这样一部反映着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作品，它更不可能產生在“和平”的年代。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充實的証據，來說明它確實產生於某年某月，但是，在明嘉靖郭武定刻本以前，已經早有流傳的原本，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周亮工（“書影一”）說：“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這可以證明，它最遲是產生在明初。所以“水滸”的產生，是和元末明初的農民起義，有着一定的血肉联系，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因此，“水滸”作者即使在安排現成題材時，也融合着他自己對於生活的見解。他是結合着現實社會生活現象，使它們在相互作用中彼此補充，而形成一個整體的，絕不

● “文藝報”第二卷第二期，“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

● “人民文學”一九五三年六月號，輯登；“‘水滸’是怎样寫成的？”。